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目录

| | | |
|--------|-------------------|-----|
| 【乱世人生】 | 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上） | 田炳信 |
| 【人物追踪】 |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今何在 | 张 从 |
| 【各抒己见】 | 谈谈文革中的“奉旨造反” | 胡 平 |
| 【前车之鉴】 | 我们要感谢“文革”的五条理由 | 丁学良 |
| 【往事非烟】 | 长沙知青大逃亡——文革五十周年祭 | 陈秉安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乱世人生】

金敬迈：荒唐的红与黑（上）

• 田炳信 •

人物：金敬迈，《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广州军区离休干部

时间：2005年2月19日

地点：广州市童心路5号聊斋吧

赤橙黄绿青蓝紫。

红是颜色之首，紫是颜色之尾。首尾相联，大红大紫。往前往后，都会进入黑的领域。

黑色中，星空是情侣的私家星空；黑色中，单体生命才有休整的宿营地。

黑色是一种最强的消溶剂。温情、血腥、浪漫、无耻的战争故事、爱情故事、政治故事、经济故事，大多在黑色中完成交易。

黑色不是一种坏颜色，黑色是一种真实的颜色，但经常掩盖着许多不真实的颜色。

黑色是一种需平反的颜色。黑色是用量最大的一种颜色。黑色是一种最真实、长久的颜色。是顶级色，是颜色之总和。

金敬迈，今年76岁，你很难想到他在秦城监狱关押了2864天。没有疯，没有神经质，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奇迹。人的意志有多厚重，人的骨头就有多蛮横。

一个单体生命是一件鲜嫩、逼真的道具，而社会则是多么铺张、奢侈的一个大导演。就像蹦极，你从高空坠入深谷，来回晃悠，颤颤，心惊，肉跳。在政治的蹦极中，不是谁都有机会走到极限的两头。金敬迈大红登上天安门，大黑栽进秦城监狱。不是谁都能在这两极游走的。

田炳信：我听说你晚年要写三本书：《天堂》，《地狱》，《人间》。我想跟您探讨这三本书的名字能不能改一下，每部书只用一个字：《天堂》改为《假》，《地狱》改为

《丑》，《人间》叫《恶》。与真善美对立起来。你回顾一下你的前半生，不管大红大紫大黑，你所体验的是假，我认为你并不是要积极地去图表现，要当个什么大官，而完全是命运的大风，呼一下把你吹上去了，并不像有些人通过钻营、投机来向上爬。我还看了资料，说到你写《欧阳海之歌》有些章节做了几次修改，我说了，在那种情况下，有人让你修改，是莫大的皇恩浩荡，最高指示让你改，不要说你不改，发自内心都要去改。人不能离开当时的环境特点去说话。

金敬迈：有人议论我的那些修改，我就奇怪，当时是什么环境，什么人让我改？很多历史别人不了解，了解的也不愿说，白纸黑字就是历史，扯谈。真实的历史往往并不能真实地表现出。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睡着了。现在，我醒了。

田炳信：其实，历史离不开历史上扮演的角色的机遇和环境，离不开写史的人的心态和处境，离不开读史的人的心情和阅历，离开这三点，任何一件事都无真实可言。

金敬迈：我觉得我很悲哀，我想做一个好人，想做一个真实的人，都做不到。这些年我尽可能真实，但就这样子，都还是做不到。

田炳信：是你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呢？还是社会不让你过这一关？

金敬迈：我现在倒不在乎这个了，我76岁了。

田炳信：孔子讲过一句话：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不逾矩，随心所欲。我理解那个“矩”，就是法律。你只要不杀人，不放火，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岁数应该是一种随意、无所谓、通达的心境。

金敬迈：我也不想杀人，不想放火，我想做好事都不让。这样我说我的，你记你的，爱怎么发你自己负责。本来我说，我说过的我完全可以负责，但别人偏不让你负责。所以为什么叫把关呢？意思就是有人替我负责，不用我负责。我要自负。我讲完了，就是有最高指示，我该杀，我也不在乎，一个人难得活70多岁，一般来说，是够了。

田炳信：人生七十古来稀。

金敬迈：而我已经是70有6了。

田炳信：赚回来了。

金敬迈：而且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是多余的，也是没什么价值的了。我先把我的观点表白，现在报纸上经常说我或者我又怎么说的，有真有假，有误传。我的基本观点要说清楚。我很苦恼，但并不是说愁吃愁穿，毕竟我是个离休的老干部，而且我也没有其他更多的欲望。我以为经历了那么一番苦难之后，我们就好了，但是没有。我觉得不如人意的东西太多，我可以有选择地说某些真话，但绝不再说假话了。

我最基本的观点是：不批判“文革”，中国就没有希望；不批判“文革”，我们这个民族绝对没有希望。如果一个有13亿人口的伟大的、强大的民族，不认真地反思，一个民族干了什么？那是一个不清醒的民族。那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敢断言。那是不是现在就批判，我没有这个主张，我只是说如果不批判。批不批，不由我。我今天上街去振臂一呼“打倒谁谁谁”，我就给抓起来，而且不必公审，要想我死的办法多的是，比摁死一只蚂蚁还容易。我已经被摁过一次，没被摁死就是了。所以，这个基本观点明确了之后，谈什么都好说了。

田炳信：我们这篇访谈，我想起这么个题目，叫做《荒唐的红与黑》，我想在中国一个人的书发行了3000万册，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如果说还有第二个人，也不多。

金敬迈：罪过，罪过。

田炳信：不，这不是一个普通数字的概念，不得了。此其一。其二，一个普通战士一步当上文化部长，管你怎么样，当一天也是。然后又到了秦城监狱，还是一号监狱。吹牛的话：天堂、地狱一步到位。我常开玩笑，我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记者的时候，有个笑话，一个老牧民喝多了，一下掉到内蒙古草原的一个茅坑里了，捞上来后，老牧民还吹牛说：“这算什么？我在北京的大茅坑，喝醉了还掉下过去呢。”就是见过大茅坑，见过大世面，闯过大码头的意思。我这是瞎类比了。所以，今天看来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很荒唐。人生难得碰上一件像样的事，你几件都碰上了，你看来还真是个大命之人，命硬之人。中国人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仁，五德，六读书，七工，八计，九盘算”，起码的“一命、二运”你都沾上了。

金敬迈：你忽然勾起我一段愤怒，今天上午看体育频道，在NBA开始之前，有一个节目说是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试验，看他会怎么样。我看到这里，我几乎想砸电视机。24小时会怎么样，你看我金某人关了2000多天是怎么样。关24小时能测试出什么？他那是玩嘛，是个少爷吃饱了撑的，真是愤怒，这算是什么游戏，人们怎么这么容易忘记历史呢？

田炳信：人类的群体记忆确实是很容易忘记过去。不过，你有你特殊的人生经历，也遭受了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到的遭遇。我相信，对某些人物，某些场景，某些细节，你会比一般人更敏感，这种情绪的出现，你自己有时都很难控制，是不是？

金敬迈：确实是这样，前不久，我去参加一个活动，大概是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55周年，在顺德的某一个镇子上，举办一个文艺晚会。本人作为嘉宾之一，跟部队的很多作家一同前往，有《西沙之战》作者张永枚等。去的时候，我们同车的几个人一起聊天，一下就谈到了毛泽东。由于有不同的观点，就有点话不投机了，我没有吱声，因为我们的私人感情还是不错的，个人的观点可以保留。你可以说毛泽东好，我尊重你的观点，只要有根有据，怎么说都行。其中，张永枚对另外一个作家就有意见了，说：“你这么议论毛泽东，我不能认同，毛怎么都是伟大的领袖。”我就出来打圆场：“这个事就不争了，谁都说不清楚，各有各的道理。”但当时还是很愉快，我是个脾气很燥的人，我还是忍住了。在文艺晚会上，恰好有一个节目，是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古月来了，我们几个都是坐在前排，部队画家胡一川80多岁了，就上到舞台握着古月的手说：“主席啊，当年我参加了座谈会，很受教育啊……。”握着手不放，因为当时是现场直播，节目没法继续演了。古月灵机一动，撇开胡一川走下台，与到场的嘉宾握手，喊起“同志们好！”台下自然就热情万分，全体起立鼓掌欢迎。古月一直走过来，与大家逐一握手。我和张永枚坐在一起，我想，这回是我表表我的态度的时候了，古月握完张永枚的手，轮到我，我就坐在位置上，两手抡在胸前，一动也不动。我想，我干嘛要跟你握手，就是毛泽东来了我也不握，更何况你是古月。后来我还听说这场演出古月要了4万块钱的出场费，你是在表演，如果我也站起来跟你握手，那么我也是表演者了，我也要分3万9，我怎么也不能比你古月“次”啊。全场都站起来了，就我坐着。

田炳信：古月不认识你？

金敬迈：不认识，当时他愣了一下，就跟旁边的握手去了，这就是本人的基本态度，我不能假装站起来跟他握手。

田炳信：现在您连作秀的兴趣都没有了。

金敬迈：这一段转播不知道怎么让孔捷生看到了，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到底老迈还是老迈》。

田炳信：我们还是回到《欧阳海之歌》。我给写《雷锋》的作者雷润明作了一个采访，雷锋是怎么样出来的。写这个的时候，我想到欧阳海。在当年，雷锋是1963年2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出来的，标题叫《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3月5日，毛主席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我又看资料，你写欧阳海的时候，是1963年，发表是在1965年，我想在当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比喻雷锋是一首诗，一首短诗，那么欧阳海就是内蒙古族长调。因为你那是长篇小说。前后有没有这种脉络？当时是苏联对我们进行一种封锁，国内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我认为有人为因素造成的灾害，不仅仅是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每一个中国人虔诚的，无私的，自觉的牺牲和奉献。所以我们就制造了这些英雄人物出来。新华社的一个老记者跟我说，雷锋是一个和尚，一个好和尚，他只是修炼自己。做点好事，他不如张志新，遇罗克，敢于和大的恶势力作斗争。他更不是菩萨，因为菩萨要普渡众生。他只是一个好和尚。《欧阳海之歌》在当时的背景下，因为我了解过，你当年并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一炮走红。陆陆续续印了三千万册。全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章杂志转载。你现在已经是古稀之年了，你回头看看，冥冥之中这件事情是否连在一起了。雷锋成了欧阳海的一块砖，欧阳海成了雷锋的一块玉，就是抛砖引玉。一本书，仅次于毛泽东选集的发行量，那是一本圣经，准圣经。我小时候读了好几遍《欧阳海之歌》，我都想，有一天我也要成为欧阳海那样的英雄。那本书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你能不能谈谈这本书的背景。

金敬迈：你把我拔高了。我来说说欧阳海的创作。我是一个很不本分的人。

田炳信：骨子里就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从小就是这样？

金敬迈：我从小就是一个不本分的人。我很不安于现状的人。我不能鹤立鸡群，我就要鸡立鹤群。我反正就要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高，我就矮。别人都高瞻远瞩，我就看到近处。我很聪明。我说有点小聪明是谦虚。我记忆力极佳。

田炳信：是天生的。能举个例子么？

金敬迈：就说我当兵吧。本人在部队里一直演主要角色。演话剧，歌剧我全是主要角色。这个戏叫李国瑞我就演李国瑞，这个戏叫秦道政我就演秦道政，为什么呢？我的个子也不高，形象也不是英雄形象。我背台词特快。剧本我一般读三遍，我就能从头记到尾，拿歌剧来讲，我只要练一次，我就不仅记住台词，连调我就都会唱了。我不会五线谱，但我会简谱。反正一比，就用你了。别人还没排练呢，你已经会了，而且不忘词。所以，我就很不本分。演出之前，跑龙套，我也能跑龙套。拉小提琴，我也能拉，吹黑管，我也能吹响。跳舞，我也不错。来小翻，我就翻不了。因为没有童子功，小时候没有练过。后来唱歌剧，因为没有专业培训，所以不懂变调，瞎喊，把嗓子喊坏了，声带喊裂了。再后来，好条件的同志越来越多，我的形象又不高大，慢慢就变成演群众角色了。

田炳信：由鹤立鸡群变成鸡立鹤群了。

金敬迈：再后来我没有办法演戏，是因为我摔了一次狠的。那是演南海战歌，我演一个战士，跟一个匪兵搏斗。匪兵把我绊倒，然后我一个空翻，再然后跟匪兵搏斗，匪兵又把我一脚蹬开，我从悬崖上仰面倒下去。那悬崖也就是一人多高的一个台。台下放一个麻包垫着，然后旁边两个人在旁边护着。因为我演过戏，有功底，就我能空翻，所以就由我来演。一切都按部就班在演，我被匪兵一脚蹬去，我大叫一声：“啊……”，仰面向后倒去。结果我一倒下去，嘭一声巨响，我狠狠地摔到地板上。原来那天他们忘记了放麻包袋，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两个在下面接着护我的人也没有来。当场我就摔得动都不能动。幸好戏里面我也就是牺牲了不用再上场。我的腰就成了90度弯着，动不了。要是今天，早送医院拍片子去了。我咬咬牙，就休息了一下，就没事了想着不怕。但走路还是90度弯着腰走。后来，我闲着没事，我又闲不住。因为我念过高中，能写些幕前词，就是在演出之前，结合所在的部队的特点，做一些赞扬，表示敬意的一些开场白。他们让我写，觉得我写得很不错，每次都有一些新的花样。

我们55军的政委，要写个剧本。就派我去，协助政委写。结果到了之后，政委说，你来写，我来给你出主意。我一听就说，不行，我没写过剧本，只写过幕前词。政委说，没事，尽管写，谁一生下来就会啊。结果，我就写了。我就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写好了，大家说，老迈还是不错，有潜质。结果，就是摔了这么一跤，我就开始了写作的生涯。如果不是那一跤我可能就干别的去了。我是62年10月25日调到创作组。从演员队调过去。

田炳信：你不是在55军么？

金敬迈：不是，我在广州军区。在军区的战士歌舞团。我调过去之后，就写了个剧本，叫《一个战士》。

田炳信：是《欧阳海之歌》么？

金敬迈：不是。但基本上就是原形。我要写一个怎么样的战士呢？我要写一个比他的领导高明的战士。

田炳信：其实你是在写自己，有没有这么个意思在里面？

金敬迈：对，这说是写自己，好像有点高了，我其实是想写我心目中的战士。我套用了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狗咬人不是新闻。

田炳信：人咬狗才是新闻。

金敬迈：对，领导比战士高，不算什么，战士比领导高，才有突出。我总有一个观点，并不是说处长一定比科长要高明，科长要比科员高明。不是你坐的位置高你就一定高，人的智慧是由大脑决定的，不是由屁股决定的。而我们现在，当然现在更厉害了。以前五、六十年代，我是指导员，我就一定比你强。当然，你有的地方比我强，但并不是所有的方面你都比我强。但我们是把人从人品上，价值上，智慧上都按官位大小做了排比，分成等级。我认为这是极其愚昧落后的作法。我要写一个全面比领导强的战士。论能力，论人品，论智慧，各方面都比领导强的。我一定要写出这么个好战士来。但怎么才能比呢？领导不可能和你战士比，指导员、连长从不说我们来比工作，怎么能比呢？组织决定了连长做的工作，不可能由

一个战士来做，没有办法比，那么这就是个虚的。但有一点可以比，那就是死，生死是可以比的。在死亡面前，人人都是公平的，这是可比的。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碰到了欧阳海。

田炳信：哦，你是在这么个情况下碰到欧阳海的。

金敬迈：对，我已经写了，写了两次。没有高潮，没有结果，虽然有精神，但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就像是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我得救了。

田炳信：你是怎么听到这个事的？是被报道出来，还是听到这个事自己去看呢？

金敬迈：不，是我写不出来了，领导说：“你这是不深入群众，不深入哪里写得出来？到下面去，一起摸爬滚打，掉几层皮，同吃同住同劳动，屁股要坐到工农兵那边来。”我被反反复复地教导，虽然不想下去，但还是没办法，还是下去了。

田炳信：下到哪里？

金敬迈：下到湖南衡阳，我下到139师去了。欧阳海是140师的，140师在衡山。我在衡阳写不出来，师领导对我很照顾，就带我到衡山去散散心，政治部主任陪着我去。爬衡山的时候，听说出了个事，有个战士调皮捣蛋，被火车压死了。我问是怎么回事？他没有好好地行军，跑到火车站轨道上去推一匹马，说是马受惊了，跑到轨道上去了。用得着你推吗？火车来了，马自然就跑开了，结果马不肯走，他就去推，火车一来，马还是跑了，人哪有马快啊，结果人给压死了。

田炳信：这是事故啊，在当时这是事故吧？

金敬迈：对，是事故，匆匆忙忙把这个战士给埋了。这个战士平时跟指导员关系就不好，捣蛋得很，这都是他们编出来抵毁欧阳海的。

田炳信：那个战士就叫做欧阳海？真名就叫欧阳海？

金敬迈：对，真名就叫欧阳海。我说，那我去看看去。我到了140师跟战士们聊了起来，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人人都说欧阳海好，倒是那个指导员鸡肠小肚的，怪不得让战士们瞧不起。当时还有新华社的记者在采访，一共八个人在采访。

田炳信：这时候欧阳海还没有推出来吧？

金敬迈：还没见报。这么多人一起在采访，最后就用了我的那篇报道，当时本人风格还是很高，把八个人的名字都署上了。

田炳信：欧阳海的这个报道署了八个人的名？

金敬迈：对，八个人的名字。因为我见到八个人都在采访嘛，而且我们八个人的意见都一致，欧阳海是个好战士。

田炳信：这篇报道在哪里发表？

金敬迈：《解放军报》。发了之后，很快就命名为“爱民模范”，这才把欧阳海挖出来。

田炳信：把欧阳海的尸体挖出来？当时埋得很草率？

金敬迈：是，出了事后就草草地埋了。碑都没有，就埋在事故现场旁边，也没有坟。起出来后，又到耒阳去安葬。这个报道写完了，也就拉倒了。我倒是暗暗地有一个小想法藏在心里，我想把欧阳海牺牲这个事借到我的小说里面去，移花接木，接到我那个小说的战士身上，那就完美了。因为我那个战士没有结果嘛，现在就有结果了，就这样，我就跃跃欲试。回来后，我就跟团里说，我想写个话剧。团里说：“很好啊！”但就是这火车上不了舞台，战歌还是很有传统的，写抗美援朝的时候，吉普车上了舞台，写南海战歌的时候，船上了舞台，当然是重新做的一条大木船，幕布一拉开，观众就直鼓掌，效果很好。火车太大了，上不了舞台。我想，我能不能写个小说，但是由于我没写过小说，团里就不赞成，认为我是好高骛远，还不会跑，就想飞，还是老老实实走吧，你这人是有点小聪明，但就是过于自信，长篇小说，你以后再说吧。没办法，我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后来，47军的政委叫孙正，他听说军区话剧团有个姓金的来采访过欧阳海，就想让我写点什么，听说我想写小说，他立刻就同意了，并马上给黄永胜说了，如果话剧团不同意，孙正来替老金请假。黄永胜就同意了，转告政治部，通知剧团让我写小说。团里来跟我谈话：“你不是想写小说吗？现在机会来了。”“我？不不不，我走都还走不好，我怎么敢飞？我不写。”“你写嘛，实践出真知嘛。”“不不不，我没写过，我绝对不写。”

田炳信：你跟他赌气赌上了。

金敬迈：嗯，团领导发火了：“你严肃点好不好？别东扯西扯的，这是政治任务。”我才同意：“那我就试试看吧。”“你要多长时间？”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你怎么也得给我一年半载的吧。“一个月怎么样？”“一个月？哪用得着这么长时间？两天就写出来了。小说，他们不都是那么写的嘛！”

田炳信：你看来是没经验，夸海口了吧。你也算是够自信的啊，哈哈。你关键是没有写过？

金敬迈：啊，他们是瞎扯蛋，搞了一辈子，屁没写一个，让我这么个新手写，一个月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哼，你为难不了我金某人，老子保证不用一个月就写出来，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写出来。

田炳信：哦，你是又赌气了。

金敬迈：赌了，真赌成了，28天写出来。

田炳信：多少字？

金敬迈：30万字。

田炳信：28天？

金敬迈：28天！

田炳信：一天一万字啊。

金敬迈：对，就是用笔写出来的，那时可没有电脑。

田炳信：用圆珠笔，没钢笔吧？

金敬迈：特意买了一支派克钢笔，10多块钱。

田炳信：那时候是贵重物品啊，你工资多少？

金敬迈：100多块钱吧。

田炳信：那你算工资高的了。

金敬迈：就这支钢笔，给写秃了。那时候跟爱人、两个孩子住一间房，又闷又热，一间房，一张床。

田炳信：是什么时候，夏天么？

金敬迈：对，5月份开始写，写到6月份。老婆在旁边扇扇子。

田炳信：你光着膀子写的吧？

金敬迈：我只穿一条短裤衩，点根蚊香。他们在蚊帐里面，我在蚊帐外面，台灯用报纸罩好，因为孩子们第二天要上学，老婆要上班，我就只能是趴在桌子吭哧吭哧地写，不写完就不睡觉。

田炳信：夸下海口了，逼着自己干，这种事也只有你敢这么做。

金敬迈：是我的性格决定了，是我的“恶劣作风”。我就是赌气，我就是要写一个战士比他的指导员高明，我就是要证明我一个小兵一个月内就能把小说写出来。

田炳信：这28天你就一直呆在家里写吗？

金敬迈：我写这个小说我心里有底稿了，而且写战士“反”领导，我特有情绪写，正中下怀。另外，领导也太小瞧我金某人了。

田炳信：那时候你才20多岁？

金敬迈：不不，我30多岁了，我是1929年生的，当时30多岁了。写这本书并不是很容易，我还花了些心思。首先我这个“反”指导员的战士，不是调皮捣蛋的“反”，是从正气上来“反”。为了这个，我要先写一个好的指导员和好连长，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这两个好领导，后面再来一个坏领导，这一比，然后是两个领导都走了，换了新的指导员来，叫吴学新，实际中的这个人叫吴新文。

田炳信：是真人吗？是欧阳海所在连队的指导员吗？

金敬迈：对，就是欧阳海的指导员。名字也来不及改了，就叫吴学新，没办法再斟酌了，赶快弄，弄完后就报上去了。结果，团里对这个不怎么感兴趣，刚好赶上抗美援朝，要排戏了，排个叫《南方来信》的戏。

田炳信：那小说呢？也放下了？

金敬迈：对，放下了，排戏重要，领导说了，是党交给的任务。

田炳信：你忙半天，想得个表扬夸奖什么的，结果“辛苦了”都没一句。心里可不舒服了？

金敬迈：没有一句表扬，我又跑龙套去了。

田炳信：我年青的时候也干过这种事，刚到新华社，大年二十九把我派到“草原英雄小姐妹”达茂旗新宝力格苏木去采访，采访完回来路上还出了车祸，差点从悬崖上摔下去，还好回来了。在旗里，我将写完的稿子叫《新春三迎》，跑到旗邮电局，我写了将近两千字，拍电报回社里发。邮电局一般都发些啥电报呢，都是诸如“母病速归，几月几日”之类的常用词，结果我一篇两千多字的通讯，全部用电码给发回来，3个邮局职工忙了一上午拍到北京去，后来《人民日报》也用了。我刚出道，年轻人，有点好胜心、虚荣心，总想领导表扬表扬一下，我回到呼和浩特，跟领导说，我写完了也都发了，结果领导没吭声。我还是刚新婚，你们都在家过年，我跑下去完成任务，结果没有一个人表扬你半句。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人家那是收拾你，你还自己得意洋洋呢，我后来很晚才明白，那种感觉就跟你一样的，所以特别理解你的心情。那后来就跑龙套去了。

金敬迈：嗯，我也没抱太大的期望，也就是安慰一下自己，证明自己在一个月内有能力把一篇小说写出来。我也不是一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写字的人，我的字，一页稿纸，头一两行还能认认真真，到后来，就越写越潦草了。然后又翻一页，头两行又是规规矩矩。都是这样的，所以我自己也没来得及去看，自己也看不懂，得前后看看，根据前后的意思来猜。后来，那《南方来信》没有去广西前线演出，又放下来了。到了9月份，鲁艺来广州约稿（《解放军文艺》社的副主编），找了什么梁新、肖艺等名气大的作家，我还名不见经传呢。由于这些作家以写话剧为主，话剧不适合出版，正准备走的时候，鲁艺说：“听说一个姓金的在写一个什么小说，不知道写完了没有。”因为他第二天要回北京，就约我当天下午见面，我就把稿子找出来，蹬个自行车就去珠江宾馆见他去了。鲁艺问我写过些啥，我说我没写过什么，是写着玩，练练笔来的。鲁艺说：“那你把稿子给我看看。”我说：“别看了，连我自己都看不明白。”鲁艺说：“没关系，我反正明天才走，让我看看，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当编辑，什么怪字我都见过，只要是中文字，难不倒我。”我就只好把稿子留下，先走了。第二天一早，来电话把我叫去了，一见面，鲁艺就说：“你写的不是中国字。”

田炳信：什么字？

金敬迈：鲁艺说：“我不认识，你写的不是中国字。前三个字我认识，第四、五、六个可以猜一猜，到了第七、八、九个字，猜都没法猜。”我说：“是啊，我自己看都困难，我字不规范，又赶时间，一个月不到，20多天写完的。”鲁艺说：“什么？你到底多少天写出来的？”我说：“28天。”鲁艺说：“你28天鬼画就能画得出来，说明你写得很顺啊。你这样选几段给我读出来听听，我晚上的火车，还有时间。一共多少章？”“十章。”“好，第一章选一段，第五章选一段，第十章选一段。”然后给我泡了杯茶，我就心里犯嘀咕

咕了，我也没有看过，怎么读呢？一开始读得嗑嗑巴巴，也有很多字不认识，但鲁艺这老头还是上当了，我是演话剧的。

田炳信：哦，你朗诵水平高。

金敬迈：对，我如果能写出30、40分来，就能把它读及格，如果写得有70分，我绝对能把它读出100分来。所以我就有这个自信。我越读越来劲，抑扬顿挫，拿腔拿调。遇到不认识的字，临时改一下，编一个出来。第一节我读完了，这是要掩埋欧阳海的一个情节，还是大雪纷飞的季节，然后翻到第五章开始读：火辣辣的太阳……。 “别，别，别，怎么火辣辣的太阳了？刚才不是还在大雪纷飞吗？”我说这是第五章啊。 “别，别，别，倒回去，接着往下读，一段都不要拉。”我就只好完完整整地把第一章读完。我很投入，读完了，自己本人泣不成声。我被我感动了。

田炳信：我插一句，你写的时候有没有哭？

金敬迈：没有。

田炳信：结果读的时候哭了。

金敬迈：我写的时候只有创作激情，没空看。

田炳信：那听的呢？

金敬迈：哭得一塌糊涂，老头用手捂着脸，泪水往下滴，老头说：“你这样读太辛苦了，打个电话给军区文化部，把票退了，今晚我不走了，你别这么读，我们慢慢来，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读完就行了。我不虚此行，我还没听过这么成熟的初稿，你肯定写过东西，不要瞒我。”我整整读了三天，终于读完。

田炳信：你每天一早就到珠江宾馆去给他朗诵，第一个听到你作品的就是他啊。

金敬迈：他每天泡好一壶茶，等我给他读。

田炳信：那读完之后呢？

金敬迈：他认为这个指导员这样不行，要改。他说：“这肯定是个很不错的作品，小同志，你听我的，要好好改一下，把指导员的形象柔和一下，改好一点，不影响你作品的原来立意嘛。”就这样把指导员改成副指导员，后来又改成代理指导员，把官僚主义改成调查研究不够，不是品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有误会造成的。我就按照鲁艺的要求，把稿子改了一下，作了些润色，把太草的字写好一点。先自己整了十多天，为了把稿子写好，在油印社找了7个人，搭起桌子围成一圈，我就坐在中心。每个人发5张原稿，轮着来。不要一个字一个字问，就把不认识的字先空着，把几页都抄完。我就像下棋高手一样，轮着到每一桌上指点。就这样，搞了一个礼拜。每一页都有大量认不出的字，每抄一万字给2块钱，30万字60块钱。当时也不富裕，要养活我们夫妻双方的老人，自己的两个孩子，还有保姆。家里也没什么好卖的，没手表，最后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结婚时丈母娘送的一对戒指，我拿到东山百货大楼旁边的一个国营古玩玉器收购店去卖，收购店的人问我：“是不是你的？”我说：“是我们的结婚戒指。”“那要有证明喔。”我只好又回到团里写证明去。开好后，就又到收购店，收购店的人又说：“这对戒指，金子是不值钱的，国家规定，金银禁止买

卖。这两块石头不错，一块好点，给23块钱，另外一个20块钱，两个一共43块钱。”
“我要60块钱，43块少了点。”“不少了，这些金子不能卖，不值钱，捐出来给国家了，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国家还可以拿来出口。”“43块钱太少，能不能加一点？”“不行，就这么多了。”没办法，只好卖了。拿了钱回去，老婆说：“不要紧，我来帮你抄。”老婆的字比我的正规，她抄了17块钱的，那些油印社的帮我抄了43块钱的。抄好以后，我就寄到北京去了。鲁艺把它印成一本征求意见本，大概都送了。他当时说只送给总政的首长，萧华那肯定是送了的，杨成武都送了，他们看了，也觉得好，就给中央送了，毛主席、江青、周恩来都在这个时候看了。

田炳信：哦，他们是在还没有公开发表之前就都看了。

金敬迈：对。刘少奇说“这本小说要印1500万册”，毛主席说“这是个大作家”，这才有我后来的悲惨命运啊。

田炳信：当时的版本里有没有学毛选和学《论共产党员修养》这个情节？

金敬迈：没有，没有。后来有。叶群她们看了之后，要求要突出毛泽东思想，要加进去。我就想，如果老是说为某个人的歌功颂德，某个人会难为情，我是替你着想，多写一个来平衡一下。被人吹捧，按说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我就想，毛主席伟大，刘少奇也不错。如果太强调突出某一个，不是说共产党，强调集体领导嘛，集体智慧，你今天不是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宝贵的财富嘛！不是哪一个人的肚子里钻出来的嘛！我怎么错了呢？

田炳信：那稿子就定了，是哪一年开始正式发行的呢？

金敬迈：1965年，最后正式发行。就在这之前我本人就发过几次小脾气，我不愿乱改，不发表不出版也无所谓。我的一个老领导陈雅宾，在四野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宣传部长，挺好的一个人，很关心我。劝我改一下，我赌气说：“不出就不出，我也不想出书，不出书，我金敬迈还是金敬迈。”不干了，走了。鲁艺就急了：“你这一走，我的乌纱帽可要掉了，领导要我好好劝你把书改好，结果你撂挑子不干了呢？”我想鲁艺对我还是有知遇之恩，一开始听我朗诵老泪纵横，到后来极力推荐我的作品，如果我现在走了，也太对不起人了。我就只好说：“好，那我改，忍气吞声我也要改，违背我的意志也要改了。”改了这后呢，送给陈雅宾看，他一看就乐了：“到底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革命战士，很能领会领导意图，让他放心，我会向广东军区领导打招呼重用金敬迈的。”他果然打了招呼，后来我就回去了，果然人模狗样的，像个人物了。文章改了以后，就先送给巴金，在《收获》杂志上先发表，造舆论。

田炳信：这是65年的事，全部完整地登出来了？

金敬迈：65年7、8月份的事，完整地登了出来。登完后，又作了些修改，加了好多毛主席语录，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是不断地改，不断地加，到了10月，《解放军文艺》才发表。

田炳信：唉呀，我现在才发现，毛主席语录红遍全中国的原因，是因为先有《欧阳海之歌》红遍中国，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毛主席的语录。你这《欧阳海之歌》就是准毛主席语录啊。林彪伟大啊。这是我突然间想到的这么个问题。

金敬迈：有人说什么教育了一代青年，那都是撒谎的，最先用上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一用就灵”，本人开创了一个先河，极其恶劣的先河，心里惭愧。

田炳信：不，不，那不是这个概念。当时你不一定懂里面的玄妙，但上面的人懂啊，他们让你加啊。

金敬迈：另外一个，“最”字最多，林彪常挂在嘴边的“最伟大，最正确……”就是学我那书里的一些台词。

田炳信：有吗？

金敬迈：有，因为我为了刻画人物，在每一个人物里面总要有一些语言特色。其中一个人物就喜欢说“最……最……最……”，还有一个“关键的关键”也是书里面的一句台词，口头语。后来林彪的那些发言里面也经常有这些词“关键的关键是……”。

（未完待续）

~~~~~

## 【人物追踪】

###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今何在

• 张 从 •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署名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彘、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大字报贴出后，在北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

当晚，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来到北大，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贴在外边，强调“有组织、有纪律”和“内外有别”。

6月1日晚8时30分，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这张大字报也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的领衔人聂元梓早已“大名鼎鼎”，“文革”中成为著名的北京高校五大造反派领袖之一，但共同署名的另外六人则鲜为人知，他们在“文革”中的表现和后来的命运如何？

笔者根据掌握的一些资料，介绍一下这七位作者在“文革”中的表现和“文革”后的情况。

聂元梓，女，河南滑县人，1921年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0年调入北京大学，1963年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第一张大字报发表后，闻名全国。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1966年9月，聂元梓成为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11月8日，领衔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随后，率队前

往上海串连，煽动群众造反。1967年，任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在校内迫害干部、教师和反对自己的学生，在社会上到处插手夺权；1968年3月在校内发动大规模武斗，其支持的“新北大公社”打死无辜群众3人，打伤数百人；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终止了她在北大的权力；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先后在江西鲤鱼洲、北京新华印刷厂、北大仪器厂参加劳动。聂元梓于1978年被捕，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关押在延庆监狱。1984年12月保外就医，1986年获假释，化名“王兰”，寄居在亲友家，曾从事经商活动。近年来，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住房、养老、医疗等待遇得到落实，还经常外出参加一些活动，也有不少人到她家拜访。2005年，在香港出版了《聂元梓回忆录》。在《回忆录》中，聂元梓极力否认自己的罪行，为自己的行为鸣冤叫屈。

宋一秀，“文革”前是北大哲学系教师。大字报的第一稿是他起草的，但其他人不满意，改由杨克明起草。“文革”的前两年，他一直站在支持聂元梓一方。1966年11月8日，他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上签名。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后，部分原“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写了一份题为《历史的教训》的大字报，批评本派头头聂元梓、孙蓬一打派仗、搞武斗的极左行为，送给宋一秀看，宋说写得很好，并建议加个副标题《致聂元梓、孙蓬一的公开信》，于9月12日贴在校园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文革”结束后，继续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有两个：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著有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革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毛泽东哲学思想史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中、下，与黄楠森、施德福共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程》（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中国现代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许全兴、陈战难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国现代哲学史》（许全兴、陈战难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据北大哲学系网站公布：2015年7月3日，宋一秀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夏剑勇，“文革”前为北大哲学系教师，“文革”中受到聂元梓重用，曾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新北大公社”总部负责人。1966年11月8日，他在《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文革”结束后，继续在北大哲学系任教，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论》（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代家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著作。在曹玉文主编的《西方人看马克思主义》一书的《后记》中提到，“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夏剑勇教授等也对提纲提出过重要修改建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四卷（修订版）的《编者的话》中，写道：“对本卷提出评审和修改意见的有夏剑勇等同志，他们对初稿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阅。”

杨克明，又名杨适，生于1932年，安徽当涂县人。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读中学时即参加学生运动并入党，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留校任教。大字报的实际执笔者。1966年8月，他和聂元梓一起列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曾任筹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校刊《新北大》主编，后因与聂元梓有不同意见，被聂元梓撤职。1967年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1969年工宣队进校后任革委会委员，1971年当选为中共北大第六届党委委员。“文革”后，继续在北大任教，任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述评》（人民出版社，1982年）、《哲学的童年——希腊哲学发展线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等。2014年，笔者曾到杨克明老师家拜

访。杨老师虽已年过八旬，但精神矍铄，讲述了当年写大字报的情况，还拿出当年大字报底稿的照片给笔者看，并与笔者合影留念。

高云鹏，“文革”前系北大哲学系教师，“文革”初期曾被派到北大汉中分校任负责人，介入了当地两派争斗。1968年回校后，被聂元梓派到“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在44号楼坐镇。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后，1970年7月27日，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揭发他在1967年8月19日炸毁汉中运输公司大楼流血事件中的问题（在此事件中有18人死亡），宣布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法院处理。后来，汉中地区法院查明了事件的真相，高云鹏并无责任，被无罪释放。1980年回到北京，被借调到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1989年回到北大后，进入心理学系，任培训部主任、教授，著有《开发自我：脑、社会和心理》（与荆其诚合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心理实验纲要》（与陈舒永、杨博民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李醒尘，1937年7月28日生于辽宁省盘山县。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留校任教。1966年5月25日，未参与大字报讨论，是临时加入的，也是最后一个签名的。“文革”开始后，曾在北大驻上海联络站工作。1967年后，因不满聂元梓的所作所为，曾参加反对派组织“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文革”结束后，一直任教于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北京市哲学会美学专业委员会会长，著有《西方美学简史》、《西方美学史教程》，也曾与谢冕等人参与国内诗歌活动等。退休后，在北京舞蹈学院教授美学。

赵正义，“文革”前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文革”的前两年站在支持聂元梓一边。工宣队进校后，1969年任校革委会委员，1970年9月任哲学系副连长，1972年5月任党总支副书记，是个从事党务工作的专职干部。据北大哲学系网站公布，赵正义于2008年9月15日逝世，享年78岁。

当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个作者在“文革”中曾分为两派，杨克明和李醒尘参加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文革”结束后，除聂元梓、赵正义外，在业务和学术上都有所建树，都是教授，著作颇丰。赵正义和宋一秀已经去世，最年轻的李醒尘80岁，其他人都已80岁以上了。

□ 原载《党史博览》2017年第7期

~~~~~

【各抒己见】

谈谈文革中的“奉旨造反”

• 胡 平 •

上海学者朱学勤写道：“50年后检讨文革，不难发现一‘异象’——群众性‘造反’一开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认其正当，遭拒绝，方有游行、绝食、乃至卧轨，最后列队进京，请求‘圣旨恩准’。如此‘造反’，与汉语本义相去甚远，确实‘史无前例’。或如毛泽东所问：‘造反派，真的反了吗？’”

在文革中，“造反”是一个关键词，也是一个流行词。诚如朱学勤所说，在文革中，“造反”一词的含义确实和它的本义相去甚远。然而在当时，有那么多人起劲地用“造反”这个词，想必也有他们的道理。

在文革中，“造反”一词最早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6月24日（1966年）贴出的大字报《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据说本来的题目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后来改成《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早在6月5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人民日报》国际时评《汉弗莱的哀叹》一文中，无意中发现了一段从未见过的黑体字（那意味着是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一查，这段话出自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诞辰大会上的讲话。红卫兵大喜过望，于是在“造反”二字上作文章，写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张贴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为了捉弄当时派驻校园的工作组，他们故意不引用全句，也不注明这话是出自毛泽东。工作组果然上钩，立刻发动攻击：造反？造什么反？造谁的反？社会主义时期还造反？太反动，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十天后，红卫兵贴出第二张大字报《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文章的一开头，工工整整地抄录了毛泽东那段语录。工作组一看顿时呆住了：毛主席的话如何反得？二十天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写下《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然后，他们把这三篇文章托人送交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亲自回信，信中说：“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随即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三篇大字报全文刊出，于是，“造反”一词便风靡全国。

为什么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造反”这个词那么感兴趣呢？因为他们觉得，“造反”这个词比过去一向用的“革命”一词还更能表达他们现在做的事情。“造反”一词的本义是以下犯上，犯上作乱，是对现行政治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否定和破坏。其实，“革命”一词本来也是指对现行制度的反叛、否定与改变，只是经过共产党多年的误用滥用，“革命”的含义在一般人心目中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许多语境下，“革命”非但没有反叛否定之意，简直成了反叛否定的反义词：“听党的话”就是革命，越听话就越革命——这不是和“革命”一词的本义正好相反吗？因此，以“造反”取代“革命”或补充“革命”，至少是突出了反叛与否定的意味。

在清华附中红卫兵看来，他们的行为就是“犯上作乱”：他们反对校领导，反对工作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他们立志要搞垮现行的统治学校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秩序，这不是“作乱”吗？所以他们把自己的行为称为“造反”。在那时，校领导和工作组也认为红卫兵的言行是反动的，是反党，是反革命，换言之，校领导和工作组也认为红卫兵是在造反。红卫兵第一张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一出，工作组就洋洋得意地说：“这下子红卫兵的反动面目暴露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用“造反”这个词，确实有他们的道理。然而，文革中的造反无疑又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奇怪的造反。按照红卫兵的解释：“今天我们讲造反，是指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造资产阶级的反，造修正主义的反。”红卫兵的造反，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坚决贯彻最高指示，因此后来有人把这种造反称为“奉旨造反”。“奉旨造反”一语很传神，但似乎又自相矛盾。“造反”是以下犯上，“奉旨”却是以上制下，两者如何能结为一体呢？

是造反必无旨意，是奉旨则非造反。然而在文革中，却好像实现了这种矛盾的结合。原来，情况是这样的：毛泽东发出了造反的圣旨，下面的群众积极响应。这是“奉旨”。但圣旨本身是抽象的、笼统的，它并没有明确地、具体地告诉人们谁该反什么该反、谁不该反什么不该反；下面的群众在造反时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这就是说，群众在每一次具体的造反行动即“犯上”行动中又是没有圣旨的，因而它确乎又像是“造反”。

一方面，我们被教导说，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革命；另一方面，我们又被教导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反对。这样，当我反对某一个具体的党组织领导人（例如校长或工作组组长或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时，我就处在一种很不安全的境地：如果这个领导被裁定为错误的领导，那么我的行为就是了不起的革命行为；如果这个领导被裁定为正确的领导即代表党的领导，我的行为就成了反革命。那么，谁是权威的裁决者呢？当然，是毛主席，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接下来，也可以是上级领导，也就是比你反对的那个领导更高的领导；最后，也可以是你反对的那个领导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在造反运动初期，造反者总是要急切地要求他们造反的对象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如果对方不承认，他们就要“上访”，找更高的领导乃至找中央，因为他们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的行动得不到权威的承认，他们就会被打成“反动”、“反革命”；而一旦得到权威的承认，那就是决定性的胜利。

记得当年造反派开大会呼口号，有几条口号是专门针对保守派群众的，其中一条是“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这条口号的政策性很强，很正规，很正统，因而很流行；但正因为如此，有些人便觉得它太温和，不来劲，不过瘾，因此，他们又发明了几条更激烈、更凶猛的口号，例如“保皇有罪，罪该万死”——这分明是否认保守派“受蒙蔽无罪”；不过有趣的是，许多人常常是两条口号一起呼，一点不觉得自相矛盾。其实，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口号就是口号，要紧的是能打动人心，用不着逻辑严谨。当然，他们对这番道理多半并没有自觉的领悟。他们只是在宣泄情绪，实行吓人战术。

还有一条口号更有意思，叫“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在1967年1月，我和同学们步行串联，途中参加了一场某县农民的批判会。会上，群众一再高呼这条口号“保皇到底，就是右派”。初听之下，我觉得像小孩吵架回嘴。保守派不是老说造反派是右派翻天吗？如今造反派则用同样的办法回敬：你们说我们是右派，你们才是右派呐。再一回味，我发现其中有股不平之气。提出这条口号的造反派大概是意识到，在造反派与保守派的对垒中，造反派的地位更脆弱。倘若保守派得胜，造反派就会被打成右派，划为敌我矛盾；但倘若造反派得胜，保守派被定性为保守派，保守派还是会算成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保守只是错误不是罪名。保守派赢得起也输得起，造反派赢得起却输不起。所以，造反派感到不满意，还感到不安全。

为什么当“老保”比造反更安全、更保险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保守派之为保守派，就在于他们更遵循共产党传统的组织原则，努力维护上级领导的权威。过去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中流传一句话：“宁犯政治错误，莫犯组织错误。”这就是说，当你认为上级领导是错误的时候，宁可跟着领导一块错，也不要为了坚持你心目中的正确而反对领导。遵循组织原则的最大好处是免去了个人责任，或者说是把个人责任因而也就是个人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冲垮了传统的组织原则。毛泽东主张：“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该无条件服从，而应该坚决抵制。”但即便如此，维护上级领导仍然是一件风险更小的事情。就算你保错了，那只是认识问题。因为保守派也是唯毛主席党中央之命是从。只有在中央不曾明确表态或给出明确暗示的问题上，他们才会采取保的立场。一旦中央明确表态，保守派立刻转向。因此，保守派拥护党、保卫党的立场或曰动机总是很难否认的。“中央表态我表态，运动后期当左派”。相比之下，造反的风险就太多了，反错了便有反党反革命的嫌疑。即便到了造反大潮兴起，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凡当权派都可以批可以斗之时，不少人仍暗中相信这只是暂时现象。他们相信那些在造反的旗号下反对党的领导人的行为终归是要被清算的。“十六条”不是也规定对群众中的右派分子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吗？——后来的事情大致也证明了这一点。

□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7期，2017年4月14日

~~~~~  
【前车之鉴】

我们要感谢“文革”的五条理由

• 丁学良 •

今天是“四·五运动”40周年纪念日，虽然中国持续十年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简称“文革”）”的结束，是以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逮捕为标志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五运动”是“文革”结束的一个先声。

今年是中国重大事件“双纪念”的特殊年份——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和正式结束文化大革命40周年纪念。虽然在“文革”发动和结束的核心地区，这两大纪念日都被历史虚无主义扫荡得罕见踪影，在全球其它地区，却有层出不穷的中文外文评论发表。这些文章的史料价值和评判立场各各有异，但似乎缺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维度，那就是客观评价“文革”的巨大正面后果，这里的“客观”是指避免极左的或极右的立场。

笔者在此整理出几条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衷心感谢“文革”，依据的是历史长时段的冷静回顾，主要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的全中国上下各级的反省，那是最真切和丰富的时段。以下的罗列顺序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并不意味着前面的一条理由就比后面的几条更重要。

◇ 至少有五条重要的理由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一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终于明白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蕴含的伦理道德，不能否定得太彻底。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从十九世纪末起就一波波不间断，但只有1949年以后，才进到由强大的国家政权动员组织全民来批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且任何人为之辩护都可能被打成政治犯的崭新阶段。否则，“文革”期间子女公开批斗乃至肉体折磨父母的事不会那么普遍。到此地步，社会不再是人间世界，而是倒退至“人对人像狼一样”的野蛮状态。

近年来中国官方大力推动恢复传统文化，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里，人们对本民族的传统都会有适度的尊崇和扬弃。彻底否定本民族传统的异常行为，只能发生在政治极端主义体制下。只要政府不去强力干涉，民间一定会有多种多样承继、发扬、转换传统文化的智慧和途径。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二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铲除资本主义等于是经济自杀。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政策是步步压制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到了“文革”就进入“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最后阶段。1976年以后凡是出访外国的中共领导人，都震惊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同为华人社会的港台新加坡，都比中国大陆富裕许多倍，而且多半是在“文革”期间经济腾飞的，尽管它们那时也不是议会民主的政体。过去二三十年里演化出的所谓“政治权力垄断+经济自由半开”的中国模式，就是这么受启发而源起的，成为中国官方喉舌向海外推展的“中国特色”核心板块（参阅丁学良：《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增订版第2章）。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三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滚动式的互相揭发、无情斗争等于是政治上的集体自杀。“文革”中被残酷批斗的干部和党团员，大部分都是以前历次运动中无情揭发批斗别人的积极分子。他们本以为自己过去当过革命打手，就戴上了“铁帽子”永远受保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革过去革过别人命的人的命！”林彪这句精确无比的话，讲明了不断革命、永远革命的动力学。轮番迫害过他人的人，被更多的他人轮番迫害，终于把90%以上的人统统弄成了程度不等的受害者。于是，1976年后，听到新一轮迫害的动员令，越来越难以形成“上面一呼，下面百应！”“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林彪语）的红潮。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四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中国不能自绝于世界文明主流，关起门来胡乱瞎搞。近代中国本是对外交流逐渐宽松，得此之便，全人类文明的多样元素涓涓细流浸润华夏，从沿海到内地。这个大门在“文革”前已经狭窄异常，1966年起就完全关闭。于是多元、宽容、隐私、人道、人权、法治等等的现代文明要素，统统被塞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箩筐扫进垃圾堆。正是在这种“革命原教旨主义”的大环境里，不但学习外语、阅读外国书籍是思想犯罪，而且对思想犯判死刑、不注射麻药就生生割喉也成为顺理成章的“革命措施”（陈少京：“张志新冤案还有新的秘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第10版）。多亏了“文革”对无数人施加的非人待遇，才使得人道主义、人权、法治这些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共推的价值，从官方的黑名单上解放出来，纳入中国的法律和文件。尽管落实起来步步艰难，至少今天它们不再是官媒每日大批判的靶子。

我们要衷心感谢“文革”的第五条理由，是它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明白了，领袖的权力不能是毫无限制、随意滥用的。中国的民众、知识分子、官员，绝大多数历来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力照单接受，并且还常为其作合理化的辩护（参阅胡德平：《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11页）。毛泽东的特别权力自1943年中共政治局“三月会议”期间初步确立后，一旦遇到党内同志的质疑，就以“革命需要”的理由顺利过关通行。一直通行到“文革”中，把当年推举毛为“党皇帝”、对毛进行个人崇拜的团队（刘少奇、彭真为首）碾碎为止，党内高层才猛然醒悟；1967年“二月逆流”中陈毅的牢骚就是因此而发的（《文革名人：徐景贤最后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2013年版第126—129页）。你只要读读1976年后众多中共老干部的谈话和回忆录，就会感受，他们是如何的痛切反省——他们是自己拼命卖力“造神”运动的可悲牺牲品。

#### ◇ 全国达成共识的基础

以上五条在笔者亲身参与和观察的视野里，是构成1976年以后十多年期间中国上下共识的基础。若缺少了这些普遍分享的可贵认知，中国不可能从政经皆近乎崩溃的边缘，那么快就跨过深渊，迈入开放改革的复兴正道。那个时段，中国有几条不成文的“禁忌”，上下都不愿意悍然打破，它们涵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社会管理、教育、文化、对外交往诸领域，生怕一打破又回到“文革”的深渊——那是几乎所有官民的共同地狱，他们都还记忆犹新，不用提醒。

假如上述共识的内容被写进普通学校的教科书，纳入党校的训练大纲，编成公民读物，当今中国的很多难题，都不至于在这么低的水平上模糊出题、反复争吵。因为当今惑人和争吵的诸多问题，当年大体上已经弄清楚了。可惜自1990年代初以来，以上共识所依赖的苦痛经验和反思，被持续地淡化和火化，以至于到了近些年里，中国内地一些说法和做法，似乎依然没有吸取十年“文革”的教训。

◇ 物极必反，绝地易道

读了本篇评论，可以预见有些读者的反驳会很猛烈：为了以上那样的共识也要衷心感谢“文革”？那些只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普通常识，难道不搞十年“文革”，人们就达不到那样水平的认识吗？

对此我只能回答：确实，它们不过是现代社会的普通常识。可是在那个时代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如果不是最高领袖带领一帮人折腾多年，一直把那条起初有着最美好许诺的路子走到底，穷尽其一切的可能，最终殃及到绝大部分掌权者和普通百姓的根本利益，全国上下就达不到那样强烈的共识。在1966年之前的中国社会里，早就有少数人具有那种洞见，可惜社会条件并没有提供给他们常规的平台和渠道去传播。只有让“文革”期间每日每时的残酷现实当教员，才能启蒙亿万干部和群众。在正常的社会里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及渠道主动展示的政治经济常识，在不正常的社会里，只能通过不正常的过程来被动展示。为此，我们要否定“文革”，又要感谢“文革”。没有“文革”导致那些神话的无法掩盖的公然破产，也许我们中国人连今天这样有限富裕和有限自由的生活都过不上。

“文革”的诸多正面积极后果，归结为一点，就是告诉全中国的干部和民众，那条政治经济极端主义和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道路，无人可以走通。

□ 原载《FT中文网》2016年4月5日

~~~~~

【往事非烟】

长沙知青大逃亡——文革五十周年祭

• 陈秉安 •

1964年，湖南省组织了数万未被高考录取的城市学生和闲散青年奔赴人口少，耕地相对宽裕的湘南、湘西农村。仅零陵地区的江永县一个县就下放了6000多名长沙知青。

这6000多人绝大多数出身于资本家、地主、右派国名党军官……的家庭，其中颇有一些三湘名人，如两江总督陶澎、军机大臣左宗棠、湖南都督焦达峰、国名党将领廖耀湘等的后人。有些公社（比如白水公社）的下乡知青中，“黑五类”子弟比列高达95%以上。以至于有些知青点要成立一个团支部会“很困难”（江永县档案《农场关于努力发展共青团组织的汇报》语），这为后来当地屠杀“地富反坏右”风潮时，屠杀到长沙知青留下了恶根。

但这批知识青年长期受到党的“革命理想”的灌输。老实、听话，一般都乐于“改造”自己，甚至有一部分知青抱有“赎罪”的心理。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年轻人积极改造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白天在烈日下劳动，晚上，还打着电筒在被窝里写歌颂党和毛主席的诗歌。

下面是一首我们将提到的一个人物王伯明的小诗《新农民之歌》：

扶着犁，扬起鞭
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
紧紧地追赶春天……

心怀“原罪”，但并不消沉；被贬，而没有怨言；深处边陲，却满怀热望，这就是当时下到江永县的长沙知识青年的心态。

然而，突如其来的事件破灭了这批长沙知青的理想追求，让他们走上了逃亡之路。

1967年8月，与江永县毗邻的道县，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蔓延到周边的多个县，也很快蔓延到江永县，转瞬间，江永县的河水中飘起了“黑五类”的尸体。长沙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

下面以事件的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述（整理），来记述逃亡事件的经过：

◇ 王伯明事件

程保罗（长沙知青组织者）口述：1967年8月17日，我们都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它是我们第一个兄弟被杀的日子。

那一天，王伯明同另一个知识青年赵子振去江永电影院对面的一家饮食店吃面。面还没端上桌，突然闯进来四个农民，拿着梭镖、鸟铳，有个人抓着大刀。对他两个说：“站起来——”子振自然地举起手。又问：“哪个是王伯明？”因为那时王伯明参加过“湘江风雷”（湖南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又喜欢演戏，有点名气，江永人都知道他是“黑五类”子弟。他回答：“我就是”。他可能以为是来追查“湘江风雷”的事，就把手伸进左边兜里去掏平反证（也有人说是掏手巾擦嘴），准备解释“我是平了反的”。哪知道农民以为他是在掏枪，叫了声“狗崽子……”对着王伯明脑壳“砰”就是一枪……

造成长沙知青大逃亡的另一根导火索，是几乎同时发生的农民围困凤亭知青农场和双方爆发的枪战。

◇ 农民围困凤亭农场和枪战

徐基盟（凤亭农场枪战主要当事人之一）口述：大约是在1967年的8月中旬，县农械厂的“湘江风雷”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江永武装部的枪很快就会被对立派抢走了，是不是合力下手？于是我们开了一辆大拖拉机，坐了20多个知识青年，开到了城里，一直冲进了江永县武装部。

我们一看，武装部里空空如也，没有守卫的人。我们果然找到了放枪的仓库。竟然找到了9挺苏式机关枪，还有20多支苏式自动步枪、日本的三八大盖、1万多发子弹……真是把我们喜饱啦！

拖拉机满载着枪支和弹药往回走，因为天气热，装得又太多，走到半路还爆掉了一个胎。

我们农场的造反派一下子成了江永县配备最精良、最有战斗力的武装。这同时也引起了江永县农民的紧张。此后，我又亲手俘获了一名向我们挑衅的民兵营长。他们早就想对知青下手了，这下找到了借口。

8月17日下午，城里传来了王伯明被他们打死的消息。农场里一片人心惶惶，大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就在当天晚上，有人发现农场四周的山头上有好多手电筒光，大家感觉大事不好，可能是被农民包围了，果然天刚刚亮，农场上空，突然传出清脆的枪声，江永农代会集中了1000多武装民兵，把我们农场团团围困了。

他们满山喊着“缴枪不杀”！“把人放出来”！

我们看来势凶猛，就派人去与他们谈判，说我们没有枪，说我们抢枪那是谣传。叫他们撤军，他们提出：“撤军可以，你们先把人放了！”我们说：“行！”立刻将那民兵营长放给了他们。

一拿到人，他们又无理提出，撤军大队要从我们农场经过，这明明是要趁机扫查农场。这等于是让我们受辱，我们坚决不同意，于是谈判破裂。

谈判代表回到农场，告诉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准备战斗”！

当时我们仗着武器精良，并不胆怯。一边让全场的60多个知青往回龙墟方向撤退，一边让武工队架起机枪，守在农场边的一座小桥——叫义田桥——的坡上，掩护大部队撤退。我架枪守在坡上，能清清楚楚看见农民进农场的情景。他们冲到女知青的宿舍里找枪，把一床床的花被子往外扔，叫人看得忍无可忍。当时我和周祥林共用一挺机关枪，他硬是气不过，朝着农场“嗒嗒嗒”就是一梭子。

这下，两边就打开了，他们那边也架起机关枪，朝我们扫射，子弹打到路边的树叶，“唰唰”地直落下来。

我们没打过仗，没战斗经验，两边都是树丛，中间一条路。我们的人，本应该躲在树丛中，利用地貌作战的，开始全部趴在路中间开枪。这不就暴露在他们的火力下了吗？果然，对面一梭子打来，打中了周祥林的脖子，他当场就倒下了。我看见血“咕咕”地往外直冒，就喊“祥伢子受伤了，快撤……”我背起周祥林，跟着队伍拼命地跑，背到马河，就没得气啦。我们一直把周祥林抬到了回龙墟，埋在那儿。当我发现日夜在一起的兄弟周祥林已经死去时，我再也忍不住了。“祥伢子、祥伢子——”地掩面大哭起来。

下葬的时候，我架起祥伢子的机关枪，愤怒地朝天“哗、哗——”开枪。

就这样，我们凤亭农场所有的知青，全部撤离了农场，踏上了回长沙的逃亡之路。怎么逃的，那是后话。

◇ 零陵“8·18”屠杀知青事件

几乎与江永县农民枪杀王伯明和围困凤亭农场的同时，1967年8月18日，零陵前进公社一辆满载长沙知青的汽车无故遭到机枪、追击炮的伏击。死9人，伤15人。人称“8·18”惨案。

长沙知青谢祥京口述：我是1964年从长沙下放到零陵前进公社农场的。1967年8月18日那天的中午，大约1点多的样子，我们场里有20多个知青要进城去。公社有一

部解放牌，正好停在我们厂里。我们就跑过去，把车门撬开了，20多个知青上了车，我点燃了火，开得“呼呼”的往城里跑。

大约是3点多的样子，我们的车子到达了县汽车站附近。

当时的位置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较陡的下坡路，下坡路的最低处是个大“之”字拐弯，拐弯处的右边是零陵县东方红小学，学校外是一道沿马路而建的围墙。

这时候我看到公路中间，怎么横着两株树呢？我还骂了一句：“缺德。”就把车停下，把头伸出去朝车上喊：“下来几个人，搬树！”

当时从车上跳下来两个人，一个是我弟弟谢祥怡，另一个是余泽。两个人把树搬开了，正要上车，突然间，马路两边“砰砰砰”枪声大作，从学校的围墙和后面的山上射出的子弹，把我的驾驶室玻璃“啪啪”打得粉碎。我感到肩上猛地一热，马上意识到是中弹了！

我还想坚持开车跑，但手已不听使唤，我又坚持开出了约20米，再也坚持不住了，就猛地一个刹车，停住了车。我从驾驶室中翻身而出，滚下了马路边的一条水沟里躲避。这时又感到屁股上一热，可能是又中了一弹！

这时候，我只听得车上一片悲惨的喊叫声：“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是知识青年——“但是枪声并不肯停止。

知青姚海不顾一切地脱下身上的白背心，站起来使劲晃动：“莫打，我们是知识青年——“结果他也被打倒。

接着唐立人被打得脑浆四溅，杨海洲被打中了，吴德胜也被打中了……

猛然间，“轰——“的一声巨大的爆炸震耳欲聋，原来是迫击炮响了，他们竟然向汽车开炮！

这时，我身上已多处负伤，血流满身，晕了过去。

下面的情况我是后来听车上的彭稚鳌说的。

彭稚鳌说：“突然，枪声猛地停了一下，他们在喊：‘下车来排队——’何小明、段良农等人顺次地下车排队，突然枪声又响了，他们竟然朝排队的何小明他们开枪！”

枪声终于停歇，我跳下了车，就看到段良农右手扶腰，手上流满了血，腰上打了个对穿洞。我又朝左前方地上看去，看横躺在车子左边的何小明：一只黄色军挎包还斜背在他肩上，肚子被打出一排弹孔，肠子已经流了出来。

我伤心地恸哭，用他挎包内的白背心把他流出一半的肠子裹着塞进他肚内……

在这场屠杀中，一共打死了我们9个知青：何小明、唐立人、杨海洲、吴德胜、陈文华、王成章、廖忠普、余泽、彭柏元。9人中，彭柏元一人是零陵知青，其余为长沙知青。伤15人。

惨案大大震慑了下放到整个零陵地区上万长沙知青。数日内，几乎所有的长沙知青都逃离零陵，寻路返回长沙。

◇ 充满凶险的逃亡路

原来，长沙知青还存有最后的一点希望，盼望通过自己扎根农村的优异表现，获得“党和人民”的认可。但是，现实粉碎了他们的幻想，当屠刀就要架到脖子上时，最后一丝留念被割断了，只有一条路：逃！

“逃”很不容易，一方面农村民兵在各处设有路卡，日夜放哨，抓到逃跑的，视为逃跑的“黑五类”，一律由“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就地行刑”。另一方面，原来从江永回长沙的公路必经道县。其实道县正在大屠杀，所有的班车都停开，知识青年要回长沙，就必须绕道广西省，再进入广东省，从广东省沿京广线回长沙。

但从江永县进入广西。许多公社必须翻越高一两千米的都虎岭，十分艰难，其时，有些知青已在农村结婚，有的甚至有了孩子，所以，长长的攀越山岭的队伍中，常见父母背着甚至用箩筐挑着孩子而行……

长沙知青大逃亡的道路有多条，我们仅举其中的几条记录。

1、铜山岭农场知青：路遇6951部队

长沙知青刘蒲生这样记录铜山岭农场的知青逃亡过程：“王伯明在县城被抢杀的同一天，深夜3点钟，饱餐一顿后，99名知青一个接一个，弯腰弓背，轻手轻脚，离开了队部，消失在暗夜之中……

“女知青王近芳走在队伍中间，她的背上，用一块蓝布，捆着周岁的小孩，铜山岭农场第一个知青后代，几个壮实的男生殿后。方向：南向广西麦岭府。”

汤志云（观留江永县的长沙知青）：“我们不敢走大路，怕遇上贫下中农追杀。翻山越岭，终于走到了广西麦岭府，我们99个人，还抱着孩子，算一算，向西北上全州，要走300百里路。向东到广东的坪石，再往郴州，也不会少于200里，走得动吗？又没吃的。这时，山下有一支军人队伍，正在麦田里收割麦子。我们顿时有了主意，一声吆喝，都去帮部队割麦子。

“这样，我们就有了接近部队的机会。再向他们说明我们是长沙知识青年、为了逃避大屠杀才躲到这儿来了。在部队帮着割了两天的麦子以后，他们是6951部队，派了军车，并由士兵保卫，把我们送上了红石渡（现名白石渡）北上株洲的火车。”

2、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知青：翻越都庞岭

下放在江永县的知青罗丹记载道：“翻越都庞岭的多是井边公社和大远公社的知青，当地人和广西灌阳的农民有一条往来的山路。井边先是十几个人同行，沿途又汇集各路零散知青40多人，随即遭民兵拦截，几位领头的知青沉着冷静，机智应对，又有公社开出的红头证明作保，一路算是有惊无险。

“有一对恋人，女知青体弱，她能爬上千米多高的都庞岭就已经拼尽了力气，男生挑着两人的行李，已经累得咳出了血。几个男生发现半山腰里有户农家，赶忙上前交涉，请求弄点吃的东西。山民马上烧火做饭，饭后为他们烧了一堆火，男生围着火堆睡在地上，女生享受优待进了屋里：老两口和三个女儿彻夜未眠，守护了他们一夜，第二天还煮了很多红薯给他们带着身上。知青感激涕零，各自掏出了仅有的一角两角钱凑拢，以表感谢……”

3、厂子铺公社下界头大队知青：全州冲击火车，集体舍身卧轨

任定一（厂子铺公社下届头大队长沙知青）：“在逼近的危险面前，我们不得已选择了逃亡。但逃亡，怎么逃？往道县和往龙虎关走广西的道路，都给民兵层层岗哨封死了，不可能过得去。幸好我们有人以前到都庞岭的深山里背过木板子，有条山路可通广西，于是先派人到小卖店买了饼干，又通知各个点上的知青不可声张，等到9月5号晚上11点，都到村北面山边的红薯地里集合出发，我们还布置说：‘每家都把灯放在窗户上点着，村里人一看有灯，认为屋里有人，就不会怀疑我们。’

“二十几个人，男的走头、断后。女的、体弱的走中间，互相帮携，在漆黑的都庞岭大山中艰难行进，终于走出了大山。

“最艰难的是从梨木到广西灌阳的61公里路。天气热，除了累、饿之外，还有一样难熬，就是烧裆，裆下走一步都辣辣的痛。

“幸亏灌阳当地的一个造反派“组织”与湖南的“湘江风雷”关系好，热情得不得了，又是管吃饭，又是安排住宿。第二天一早，又用车把我们送到了广西全州。到了火车站，他们说：‘我们无法帮你们上车，只能靠你们自己了！’

“那时，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地上、路边到处坐满了人。当时列车晚点是经常的事，有时，列车看下面的人太多，也不停车，一冲就开过去了，所以，能不能上得了火车是个大问题。

“我们早早筹划好了‘登车计划’：将二十几个人一字排开，各盯守一节车厢，只要火车一停，哪节车厢下客，就往哪节‘冲’！另一部分人就骑到铁轨上去，列车就肯定不敢开。

“终于，从昆明开往北京的特62次列车，响着汽笛，从远方开过来，停下来了！

“我们的‘三人尖刀队’：冯令明、大嘴巴、我，立时提了扁担就冲上去。车上的服务员正要关车门，冯令明一扁担就插进车门缝里，们就关不了了。

“这时，车下的十几个知青，排成一排，睡到了铁轨上，不准列车开走！

“特62次列车一看这情况，再也不敢开了。车上的负责人只好走过来‘处理’，终于同意让我们二十几个知青上车。

“1967年9月12号，这个日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们终于到达了长沙，脚踩到长沙地面的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安全了！

“这时，我看到好多先回来的知青都在车站上迎接我们，我们一齐高呼：‘毛主席万岁！’‘知青万岁！’”

◇ 大逃亡带动了湖南知青运动高涨

程保罗（长沙知识青年组织者）：“回到长沙后，我们立刻去找省革筹和支左部队47军汇报。那时具体管这些事的是毛华初、我、钟圻，带了20多个人，直接找到了他家里，毛华初很惊奇，说‘杀人杀到了这个样子，不敢想象！问我们，你们要求什么？’我们说：

‘第一，还有一些知识青年留在那边，没跑脱，要赶快派人去救他们。第二，我们问长沙要饭吃’他一听，马上给我们批了一张条子，回来的知识青年每人每月9元伙食费，还批了粮食，我们说，江永那边的知识青年，还有江永、道县那些无辜的所谓‘黑五类’他们挨一天就危险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锄头就打到脑壳上来，要快点去救人啊！他就拿起电话找了47军的作战处孙处长，孙处长就给下面的6950部队团长打了电话，叫他们赶快派部队到道县、江永去。

“此后，据说有3支部队，从3个方向包围，从广西，进入湘南一带制止大屠杀。过了一天，毛华初又叫我们去，说：‘你们反映的事很重要，我们也研究了。现在全国的形势都很复杂，中央事情太多，下面的情况有这么严重，他们不一定清楚，还得靠自己去说。’又给了我们4张火车票。‘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你们直接去中央汇报。’

“拿着4张火车票，我们很快到了北京，把湘南大屠杀和知青们的处境，向中央接待站汇了报。”

长沙知青一边向中央汇报，一边在长沙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

在可以容纳几万人的体育馆里，长沙知青为死去的王伯明、何小明等人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

谢几何（追悼大会组织者）：“我是那次追悼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被杀的江永知青王伯明，是我三中的校友。

“当时全长沙的知青组织都行动起来了。灵堂设立在黄兴路的燎原电影院。

“大游行在悼念大会后开始，数千人的队伍从燎原电影院出发，经五一广场、南门口、天心阁、火车站，绕大半个长沙一周。

“我特地安排残疾同学周俊麟拄着双拐，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接着是女知青手举死难者的血衣悲泣前行。血衣是知青保留下来的。伴奏的歌曲《怀抱战友》也是知青自作的，（唱）：‘怀抱战友，泪横流……’可谓如泣如诉。

“你想，长沙城谁没有子女在农村？一时长沙全城轰动。在五一广场、南门口等重要地段，群众观看和放鞭炮的成千上万。路旁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与此同时，长沙知青还成立了自己的红一线文艺宣传队，办了自己的报纸《红一线战报》、《反迫害报》等，影响甚大。

程保罗（长沙知青组织者）：“那时，我们就认识到，真正要让社会认识我们，没有宣传工作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就把那些原先是松散的力量组织起来。

“我们在知识青年中挑选了最有文艺才华的60多名男女知青，集中在长沙第16中排练，红一线宣传队就是这样成立的。

“红一线宣传队的演出，轰动了长沙，可谓是一票难求，最为感人的要数反映知青被杀遭遇的剧目，舞者是被杀的一位知青的女友，在《红河水》的乐曲声里，配以悲壮的朗诵和众人的伴舞，台下一片悲泣声……”

与文艺宣传队交相辉映的是《红一线战报》，它从文字上宣传鼓动，并开始了对知青运动的深层次思考。

冯鹄（知青《红一线战报》主编：《红一线战报》对开4版，在新华印刷一厂用胶印新闻纸盒红精印，一期1万份。一开始，为了报纸能够存活，不被封杀，我们还试图把批判的范围，控制在“借批刘少奇来谈知识青年问题”的框架下。但是雪片也似的飞来的稿件，却纷纷把矛头引向了深处，读者在问：为什么出生不好的弟子不能上学？为什么我们受尽欺凌还要被屠杀？最后，提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揭露和控诉的浅层次上，而是开始进一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大屠杀的鲜血惊醒了我们，经过那次大逃亡，长沙知青开始走出旧的思想框框，学会了用自己的大脑思索知识青年乃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企图从制度层面寻找知识青年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出路。这在当时是被看成大逆不道的”

◇ 第一次民间知青座谈会的召开

由大逃亡而引出的长沙知青的大游行、大演出、大宣传……波澜壮阔、空前规模，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全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7年10月，由湖南、湖北、广东、四川、河南、重庆等省市自发组织的全国性的知青座谈会在长沙召开，这次民间组织的全国性知青活动，标志着当时由长沙的知青主导的知青运动，逐步走向全国。

谢几何：“我是那次座谈会的参加者。发起和主持人是知青刘锦长，是个女同学。参加者还有后来因此次座谈会而写了《长沙知青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向何处去》的著名学者杨曦光（后改名杨小凯）等。我们广泛探索了知识青年问题、文化大革命问题以及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会后，我们又组织了代表团，前往广州。住在沙面的农垦厅招待所，又在广州召开了座谈会。并协助广州的知青办报纸，从组稿、编辑，一直到出主意搞纸张印刷……代表团还直接到广东增城县等广州知青下放点去‘传经送宝’，扩大影响……”

◇ 长沙知青大逃亡结局

当长沙知青运动一波波高涨，全国各地的知青运动也在伺机启动时，有关部门高度紧张，特意下发了文件，要求回了城的知识青年立刻返回农村去。1967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对该文件批示了“已阅，同意”（通常简称为“10·8通令”），中共中央文件在城乡广泛张贴。刚刚充满了热情的知青们，一下子掉进了冰窖。

就在知青不知道何去何从时，长沙城发生了一件胆大妄为的“反革命”事件！

一夜之间，有人在几乎所有贴在大街小巷的毛泽东批示后批上：“已阅，不同意！”落款是“知青”。

政府一方面封锁消息，追查冒犯天颜的“罪犯”，一方面公开抓捕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竟然抓了三四百人，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江永方面答允：回乡者每人发5元钱、一担谷。政府另一面又对知青父母施加压力，逼迫知青回乡，政府还拿出了最厉害的一招，停发逗留长沙的知青的口粮。没有饭吃，逃亡回城的知青再无办法，只好被迫返回江永、零陵等地。部分坚持不走的，只能躲藏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打零工，买黑市粮票度日……

1967年年底，逃亡的长沙知青几乎全部回到了零陵地区，湖南知青的第一次反抗斗争宣告失败。

……

1967年11月17日，这是王伯明被枪杀整整3个月的忌日，回到江永的长沙知青们找到了王伯明的尸骨，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8个知青兄弟抬着灵柩，满怀悲愤的2000多长沙知青跟在后头，将王伯明埋葬在一个奇特的地方：江永县政府的花坛内（现仍在）。

2012年4月本文作者和长沙知青熊有根、周楚旺来到王伯明的江永县政府内鞠躬致礼。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 | |
